

准生证引发的忧思

■本报记者 刘畅

不管是人口还是版图,中华民族一直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望族”。

1820年,中国人口曾占全球的37%,经济总量占全球33%。而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0~1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在下降。去年的《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4,而要保证世代更替中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

计划生育一直是争议颇多的话题。一本在香港地区出版了数年的书《大国空巢》,最近在中国大陆拿到了“准生证”,于今年年初由直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从2000年起便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的旅美学者易富贤,在书中带领读者探究了人口现象这一“不能说的秘密”。

畸形人口结构缘起哪般

将书名取为《大国空巢》,听起来让人感觉形势紧迫,但易富贤告诉记者,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人口的下降,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国际战略地位也将下降。如果继续保持2010年1.18的生育率,中国人口将在

2017年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只占全球5%左右),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谈到生育率,易富贤忧心忡忡。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在一百多年内将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民族,在他看来,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灾难。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人口问题是人口结构畸形。2010年中国40~44岁人口为1.25亿,20~24岁人口为1.27亿人,但0~4岁人口只有0.75亿人了,且0~4岁人口男女比高达119:100,今后将是高度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今后的国家领导人需要有杂技演员那样的平衡能力才行。”易富贤认为,这必会导致不稳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国现在面临的人口危机,正是人口结构畸形的缩影。

30多年前,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易富贤认为“如果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大约15.3亿,不会如马寅初所预测的那样在2007年超过26亿”。

虽然这一假设并不为大多数人认可,但易富贤坚持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地下降。他说,假如中国在1980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在2036年达到人口约16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不会如1980年预测的在2050年达到40亿。“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人口高峰也难以达到14亿;即便鼓励生育也难阻今后人口负增长。”

“二胎”无法弥补家庭之殇

失独家庭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目前还有上百万失独家庭,比例还非常低,如果能够妥善处理,给这些家庭以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的慰藉,还是能够让他们安度晚年的。”易富贤说,“但是今后却有近千万失独家庭的存在,对社会的震撼力将非常巨大。其他家庭也大多只有独生子女,这些独生子女照顾自己的父母都已经自顾不暇,更是无力照顾社会上的失独家庭。”

由此看来,失独家庭数量的加速增长,不仅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是对人口政策提出了重大挑战。

今年两会上,不止一位代表委员为开放二胎呼吁过。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缓和人口问题不错的过渡方案。

“其实国际国内都已经证明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易富贤毫不讳讳,“新加坡、韩国、伊朗、中国台湾地区曾经提倡只生二胎,后面废止这项政策,改为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持续低迷,难阻人口锐减。”中国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生育率全部低于1.6。

领取“准生证”的曲折经历

准生证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标志性产物。同样是“出生”的许可,《大国空巢》的“准生证”,来得颇为不易。

说到《大国空巢》的出版,易富贤回忆,这些年有十多家出版社联系自己想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都因为拿不到“准生证”而不了了之。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初步结果出来后,2012年2月中国发展出版社与我联系,准备出版新版《大国空巢》。”这家中央级出版社,大半年后终于顺利地拿到了《大国空巢》的“准生证”。

对于这本内地地板的《大国空巢》,“三审三校”的过程着实让易富贤着了一把急。“其实内容都是现成的,我将香港版《大国空巢》进行大幅浓缩,并增加了80%的新内容,包括改革内参的报告和我2010年、2012年两次回国36场演讲的内容。”

易富贤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韩国、台湾地区相当,当时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现在泰国、伊朗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2010年两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58、1.67。“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的是鼓励生育。人口基数大不是坚持计划生育的理由。”



《大国空巢》,易富贤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

阅读分享

张同吾：登临高地 俯看人生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作为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国际诗人笔会秘书长的张同吾,自1983年起就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专门从事诗歌创作研究和诗歌评论的工作。饱读诗书的他说要向读者推荐一部好诗集。

这部诗集名叫《7+2登山日记》。在书中,诗人骆英以日记的形式、诗歌的体裁记录下短短几年间,他登顶七大洲最高峰以及到达两极(“7+2”)的所见所闻,并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艺术感染力极强。

躺在睡袋里写的诗

在张同吾看来,在“现在诗坛上整体作品参差不齐,平庸之作占了大多数”的背景下,这是难得一见的好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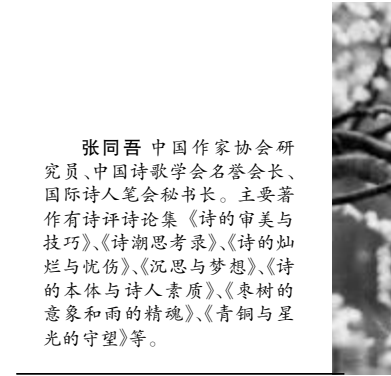
“如果将诗歌当成一种生命形式,那么当人把生命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使之登临精神的高地,从那里俯瞰世界和人生,从那里重新审视自我,便会创作出奇绝而壮美的诗篇。”初看完这部诗集,张同吾曾写下这样的赞美之词。

这种奇特选题本身就创作了一个奇迹,因为,“一个诗人能像他这样完成‘7+2’太不容易了。所以骆英用自己生命的体验开阔了诗歌的视野,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和表达是常人很难有机会去完成的。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启示:诗歌的内容要继续不断开掘,内涵也要不断去丰富。”张同吾慨叹道。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诗歌或许显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甚至一些诗歌无病呻吟。但《7+2登山日记》不同,张同吾说自己在其中感受到了“浪漫与奇特”,从来没有人在思维接近空白的绝境处有如此的诗情。

“在极昼的状态下,躺在睡袋里写诗,这经历本身就是种浪漫与奇特。”张同吾解释道。

当站在世界之巅,望着皑皑白雪,作者在不经



意间用简单的词藻记录了最浪漫的场景——“此刻 我站在世界之巅 / 眼含热泪面向世界 / 我等待朝霞升起做证 / 在群峰点亮时我向它们致敬……举起手我以人类的名义抚摸天堂 / 我在天空划出金色的印痕 / 我在顶峰刻印白色的玫瑰 / 然后在花蕊中久久跪定”。

世界之巅的情愫

更让人着迷的是,书中对于情感的流露和表达是真实的,极具感染力。

“这和我读过的很多概念化、平庸化抒情的具有爱国主义情愫的诗篇非常不同。书中,骆英的笔墨细腻传神。”张同吾也就此为记者举了个例子。

在作者明明知道“登顶下撤的路线是魔鬼设计的 / 它让你感到活着下来是一种幸运”的情况



下,他还是要“向上,向上”。他说:“我无法后退 / 因为我背着我的中国……我无法后退 / 这是我的时代 我无法后退 / 寒夜 我的中国在背包中安睡 / 我是一个孩儿 我无法后退 / 向上 我的中国决不能滑坠 / 我是一个民族的背夫 要坚定谨慎 / 向上 向上 / 我的中国在背包中很温暖很安宁”。

而当骆英以1米92的高大身躯,站在世界之巅把五星红旗挺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当这段诗被他站在世界之巅,面对着直播镜头诵出时,这种“把祖国比喻成背包,把爱国情怀自然地融入英雄气质之中的创作”足以让人动容。

“我在读这200多首诗歌的时候,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也更敬畏生命与自然,它非常符合现在倡导的科学人性化 and 人文理性化的做法。”张同吾说。

跨越三十年的缘分

■尹传红

小学五年级,11岁。《生活在电波之中》第一版距今已有30年整,也正好是我们俩之间的“岁差”!我说,我还记得,《今天的科学》是分几辑出的,一个名叫练军的同学得知我只有第一辑,就表示愿意把他手头的第二辑送我。至今我还记得那天中午放学后,我在他家门外等着他拿书时的情形。

与甘老师重续“前缘”,我倍感亲切、温馨。几年来,我们鸿雁传书、沟通频繁,成了忘年交。其间,经我向担任“少儿科普名人著书系”编委会主任的叶永烈先生推荐,甘老师的《生活在电波之中》新版很快得以面世。他在新版“序曲”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感谢尹传红先生,是他告诉我少时曾是《生活在电波之中》的小‘粉丝’,才鼓起了我续修该书的热情。”而我,则把这看做是对自己当年所受受益的一种自然“回报”,说来我该感谢、感激、感恩他老人家才是啊!

甘老师告诉我,《生活在电波之中》第一版第一次印刷32万册,以后又多次印刷再版,累计印数超过了500万册。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发大财。创作此书之前,他在大学里已教了20年的电磁场理论和微波技术课程,教材和专业著作也出了好几本,但那时还没有真正涉足科普。

1979年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找上门来,希望他为“少年百科丛书”写一本介绍电波的书。他对我回忆说:“我想应该毫无问题,就答应了。谁知一提起来,却是问题一大堆:怎么把抽象的问题形象化,怎么把高深的理论通俗化,怎么把用微积分、数学物理方程表达的问题,用语言来表述,而又能保持概念正确。甚至,怎么开头,怎么连贯,怎么结尾都是问题。”

为写这本书,让电波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活生生地出现在少年读者面前,甘老师当年反复

地想、反复地改,绞尽脑汁,足下了通俗化的工夫。比如讲到电波的波形,他写了几段“给电波画像”:

我们可以根据电力线和磁力线的概念,给它画个像。画出来的像是这样的:电力线套着磁力线,磁力线再套电力线,这样一圈一圈地套下去,电波也就越传越远了。

这样的力线图可真像一环套一环的铁链子。电场和磁场则像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手挽着手奔跑向前。

也有另一种画法,就是画一圈圈的同心圆。就像把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了一圈圈水波那样。圈圈越来越大,就表示电波传向了远方……

还有一种画法,就是沿着水平方向,画一根有起有伏、起伏交替、连绵不断的线,就像绳子被抖动的形状……

后来,《中学生》杂志专门把这一节内容抽出来选登,《少年科普佳作选》也将它收入其中。如果不努力探索,是达不到这样好的效果。那些年里,甘老师写的许多科普书和科普文章,一直都秉承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上世纪80年代,他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连续发表《茫茫宇宙觅知音》、《谁是电波报春人》等许多长篇系列文章,备受瞩目,名动一时。

在甘老师看来,科普是教育的延伸,是科研的牵线人;专业创作和科普创作,正是当年的他提高学术水平、飞向更高境界的两只翅膀。他认为写科普不能板起面孔“讲课”,应该用严肃的态度、生动的语言、恰当的比喻,必要而准确的数据来揭示所介绍的科技问题的精髓。这样才能使科普作品论之有物、看之有趣、听之有理、思之有获。

如今,七十有六的甘本波又焕发了科普的热情,仍在辛勤地笔耕,今年将接连有数部科普新作问世。

书里书外

2009年国庆节前,在一个科普界人士聚会的宴席上,主持人兴奋而又神秘地宣示:“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回来了,请他讲几句吧。”

这时,一位两鬓斑白、儒雅潇洒的古稀老人起身向大家鞠了一躬,一口四川口音也随之“流”出:“我是甘本波,大家可能不记得我了。过去我也写过一些科普读物,20多年前去了美国……”

掌声响起,老先生落座之时,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快步向坐在我对面的老前辈走去,说道:“甘老师,我还记得您!我小时候读过您写的书:《生活在电波之中》、《今天的科学》……”

老人家睁大了眼睛,十分惊讶:“是吗?那时候你在哪里?多大年纪?”我告诉他,当时我在柳州,念



甘本波创作于1979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收入“少年百科丛书”出版的两部科普著作。

把握我国科技整体发展脉络

■本报记者 李芸

新型疫苗、干细胞技术、创新材料、清洁能源革命、高性能望远镜、先进交通等领域进行了综述和概览。

此“三大报告”是“中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系列报告”,秉承“面向决策面向公众走近科学”的宗旨,该系列报告已连续出版16年了。

据介绍,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法国科学院都有为国家、社会提供年度科学发展报告的惯例。1997年9月中国科学院决定发表名为《科学发展报告》的年度系列报告,不断综述世界科学进展与发展趋势,评述科学前沿与重大科学问题,报道我国科学家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介绍科学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并向国家提出有关中国科学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建议,特别是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提供科学发展的背景材料,供高层科学决策参考。

1998年第一次出版的《科学发展报告》就在全两两会期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后来又有了《高技术发展报告》和《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组成了“中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系列报告”。16年来,该系列报告发行约50万册,其阐述的社会科学发展的观点推动了中国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和科学决策的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和科学出版社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三大报告”的发布有助于我们把握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脉络,对未来进行前瞻性的思考,提高决策过程的科学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

从文化遗产角度看建筑

■本报记者 李芸

同角度探索了建筑遗产保护的意义,同时还通过历史史实多侧面记录了建筑遗产保护与发展“人与事”的轨迹,资料十分翔实,可以作为工具书来用。

十年来,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在学术理念、学科建设、综合管理、传播普及、田野调研考察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两大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的NGO组织需要扶植、国家建筑遗产保护缺乏国家制度及跨部委协调。“城市建设的大发展,势必会让文化遗产屡遭破坏。如果不从建筑遗产的强有力保护政策制定入手,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文化遗产的毁灭速度或许会高于过去的新农村建设。”金磊说。

新书的首发式后,围绕文化城市与设计遗产的跨界研究与传播还举办了一场论坛,8位来自文博、建筑与创意设计的专家,包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徐宗威、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杭间、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胡越、LKK洛可设计集团董事长贾伟担任演讲嘉宾。演讲内容涉及世界遗产与城市文化、文化城市与新型城镇化、从文化视角看本土设计、中国设计的遗产、城市设计的图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等。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马国馨在总结陈词中说,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离不开跨界与交叉,他更希望这样的跨界交流涉及领域能更广泛。